

THE
SCHOLAR
第Ⅱ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

學人

THE
SCHOLAR

第1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文子人

主 编

王守常

汪 晖

陈平原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的资助，特此致谢

(苏)新登字 007 号

学 人(第二辑)

主 编:王守常 汪 晖 陈平原

责任编辑:朱建华 伍恒山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七二一四工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75 插页 4

字数:430,0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80-5/I·362

定 价: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	陈平原(1)
梁启超的科学观及其与道德、宗教之关系·····	汪 晖(41)
金岳霖论感觉内容和外物的关系 ·····	胡 军(83)
十年海潮音·····	葛兆光(107)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佛教新运动的 外部走向与内在理路	
廿世纪儒佛之争·····	王守常(144)
——熊十力与刘定权的争论	
“哈姆雷特”与“唐吉珂德”的东移·····	钱理群(167)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形态与轮回机制·····	王 毅(202)
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	李 零(224)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春秋观·····	陈燕谷(257)
裴頠及其《崇有论》新探 ·····	李中华(284)
论法国大革命的反党派意识·····	高 毅(302)
维特根斯坦论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	徐友渔(326)
日本明治填词与中国词学·····	蔡 毅(351)

学术史研究笔谈

- 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 夏晓虹(377)
- 国内女性文学(史)研究的现状…………… 张京媛(382)
- 宋诗研究断想…………… 张 鸣(390)
- 说双拽头…………… 冯统一(395)
- “士”字为斧形说补述…………… 阎步克(401)
- 关于“科学·道德·政治”的对话……………
 沟口雄三 汪 晖(406)

《王阳明逸文论考》一文更正…………… 吴 震(426)

- 韩国哲学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现状…………… [韩]高在旭(428)
- 韩国中国语文学界之学术活动简介…………… [韩]吴淳邦(435)
- 文学结构与文学进程…………… [香港]陈国球(448)
- 布拉格学派文学史理论评介
- 欲望的陷阱:重读茅盾《春蚕》…………… [香港]陈清侨(490)
- 并论劳动的时空构成
- 康有为与孔子纪年…………… [日]村田雄二郎(513)

英文提要

(I)

Contents

Zhang Taiyan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Unofficial Learning	Chen Pingyuan(1)
Science and the World of Man;Liang Qichao's Version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His Version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Wang Hui(41)
Jin Yueli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ual Content and External Things	Hu Jun(83)
Ten Years of“Hai-Cao-Yin”;The External Course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New Move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in 1920's	Ge Zhaoguang(107)
A Deba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Xiong Shili vs. Liu Dingquan	Wang Shouchang(144)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Don Quixote” and “Hamlet”	Qian Liqun(167)
The Complex Forms and Cycl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ang Yi(202)
The Land System in the Copper Inscriptions of West Chou	Li Ling(224)
Jin Wen and Gu Wen Schools of Classics'	

目 录

Views on “Chun Qiu” in Han Dynasty	Chen Yangu(257)
A New Study on Pei Wei and His“Chong-You-Lun”	Li Zhonghua(284)
On the Anti-Party-Politics Idea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	Gao Yi(302)
Wittgenstein on Following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Xu Youyu(326)
The Ci Poetry Writing in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and the Study of Ci Poetry of China	Cai Yi(351)
Discussion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Learnings	(377)
An Overview on the Korean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Go Jea Woog(428)
A Glimpse at the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Oh Soon Bang(435)
Literary Structure and Literary Process;Prague School' s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K. K. Leonard CHAN(448)
Desire as Trap ;Chronotope of Labor in Mao Dun' s “Spring Silkworms”	Chingkiu Stephen CHAN(490)
An Use of the “Confucian Era”; the Case of Kang Youwei	Yujiro MURATA(513)
Abstracts in English	(I)

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

陈平原

内 容 提 要

本文着重分析章太炎对官学与私学、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教育体制之间矛盾的思考。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基于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整体反思,以及现代社会政学分途的大趋势,章太炎强调“学在民间”的意义。

章太炎平生治学,喜欢把话说绝说尽,故多惊世骇俗之论。世人或喜其新奇,或恶其新奇,可难得深入探究其“奇谈怪论”后面的学术思路及良苦用心。太炎先生最令人不解的怪论之一,就是以民国元勋身份而反对新式教育,认定废科举兴学校不但不能使学术日进,反而必定“使学术日衰”;历数文科学校五大弊病后,断言“非痛革旧制不可治”;否则,“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1]。此论不出于墨守古制的遗老遗少,而出于提倡革命的勇猛之士章太炎,自是不能等闲视之。可惜学界对章氏此说或含糊

其辞，不置可否；或以之为名士故作惊人之语，不必深究。我以为，章氏之反对学校（新式教育），具体结论可能因言辞偏激而不合时宜，可其论学思路发人深思。

辛亥革命后，昔年力主废科举兴学校的康有为，也反过来斥责学校教育“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使得举国上下“人才衰落，志节衰颓，惟求利禄，何知仁义”^{〔2〕}；此等“旷邈千里，寂然无士”的局面，反不及科举时“学道之风未辍”，“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至此方才明白“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用也”^{〔3〕}。同样对学校“师欧媚美”，以及新学之士“道德沦丧”很不以为然，可章太炎的批判远不止于此。首先，章氏谈论学校功过，着眼点不在启蒙教育，而在学术发展，故时贤最为热心的幼学、女学以及平民教育等，都不大在考虑之列。其次，章太炎注重学制与学术思想之间的联系，在谈论学校的得失时，是把它跟西学联系在一起，反过来，书院讲塾则是与国学密不可分。最后，章氏之抨击新学堂，关键还不在于新学堂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的优劣，而在政府倡办新学堂这一决策的得失。也就是说，章太炎表面上讲的是旧学与新学，而思考的中心其实是官学与私学的关系。因此，这一思考的意义主要不在教育史上，而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章氏对新式教育体制的怀疑，其实是在思考中国学术传统如何面对（适应）现代社会以及以西学为背景的西方教育制度这么一个重大问题。章氏没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其提出的若干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无数中国学人，并未因时过境迁而自行消解。



晚清国运衰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学士，纷纷谋求救亡

图存之道，科举与学校之争一时成了热门话题。“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可到了“岌岌如不终日”的时节，守旧如王先谦者，也都主张以策论代制艺，“充之子史，以博其趣；推之时务，以观其通”。问题是策论虽优于制艺，可是否真是最好的“求才之道”，这一点连主张策论取士者也心中无数：“吾亦非谓策论即兴起人才之本也，思先避制艺之害而已。”^{〔4〕}传统学制内部改革的路子走不通，只好向西方寻求真理。于是，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越来越高。从1892年郑观应的“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5〕}，到1894年谭嗣同的“故夫变科举，诚为旋乾转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6〕}，再到1898年张之洞之“西国之强，强以学校，……我宜择善而从也”^{〔7〕}，各家身份地位及政治倾向大有区别，论学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可都承认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而是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不能再死守祖宗家法，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有复兴的希望。

从只承认西方“船坚炮利”，到意识到“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8〕}，因而倾向于从变科举兴学校入手搞改革，无疑是一大进步。梁启超对这一思潮，有一精彩而简洁的概括：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9〕}目的是“强中国”，关键则在于“养人才”，至于“兴学校”与“变科举”何者为“第一义”，倒也不必强分轩輊，说到底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你固然可以说科举不废，学校难兴，也可以反过来说学校不兴，科举难废——晚清维新志士大致从这两个不同角度论述改革学制的意义。这其中康有为关于“治病”的比喻最为精彩：废科举是“吐下而去其宿病”，兴学校乃“补养以培其中气”。^{〔10〕}

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以“以革政挽革命”为“今之亟务”，论政

时与康梁大致相同,也以废科举开学校为“昌吾学”、“强吾类”的良策^[11]。《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中针对中国“人终以科举为清望,而以他途为卑污庠下,则仍驱高材捷足以从学究矣”这一现状,主张立学会开民智;《变法箴言》则认定“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显然以兴学校为变法之本;《鬻庙》中干脆主张斥卖“淫祀寺观”以“增置学堂”,当务之急是开民智以救亡图存,故“鬼责无所惧,人言无所恤”。以上三文基本上是呼应康梁的主张^[12],还谈不上独立的政治见解。章氏颇有自知之明,政治上与康梁分道扬镳之后,论及科举与学校之争时也都改弦易辙。《论学会》及《变法箴言》二文固然不曾收入文集,《鬻庙》虽入《诂书》初刊本,1900年作者手校《诂书》时也被断然删去。

不过,章太炎不喜欢新学堂,并非意气用事,故意与康梁划清界线。即便在附和康梁攻科举倡新学时,关于学会的功能与作用,章太炎与康梁的看法实际上颇有距离。“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13],对学会“闻见易通”这一基本功能,双方没有什么争议;只是在政府与学会的关系上,双方意见很不一致,实际上已隐伏着日后分手的危机。康有为提倡学会,是借民间之力辅助政府办学:

盖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研精,民会则专门讲求,故能事事新辟。^[14]

着眼于替政府“补天”,康有为当然希望政府能对学会给予支持,尤其羡慕泰西之立学会,“自后妃太子亲王大臣咸预焉”。在康有为心目中,学会只是政府办学的第二途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如农学会、矿学会、商学会),“有一学即有一会”,便于师友讲求疑义,切磋学问,可以作为学校的补充。也就是梁启超说的,办学应该:

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15]

而章太炎之倡学会，首先针对的则是政府的愚民政策：

呜呼！昔之愚民者，钳语烧书，坑杀学士，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虽愚其黔首，犹欲智其博士；今且尽博士而愚之，使九能之士，怀宝而不获用，几何其不为秦人笑也？^[16]

正是基于对政府办学诚意及能力的怀疑，章太炎才力主民间“搜徒索偶，以立学会”。不是政府“精神有限”，故办学不力；而是办学的责任与权利本就在民间，不待政府的提倡与奖励。

政府不能任，而士民任之^[17]。

这才是章太炎立学会的本意所在。此等“豪俊成学之任”，推其本意，乃民间“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符合“古之明训”。以民间的“学会”（书院、讲习会）与官府的“学校”抗争，章氏此后论学、办学的基本路向，在此已露端倪。

章太炎第一篇公开批评新式学堂的文章《与王鹤鸣书》写于1906年，这并非偶然。科举与学校之争，在晚清绝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章太炎即便对学校不以为然，也不会在科举未废之时为其辩护——其时攻击学校很容易为顽固的守旧派所利用。百日维新虽然以流血告终，可康梁等人主张的新政实际上仍在悄悄实行，变科举开学堂更是大势所趋。1901年张之洞等奏请递减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1903年张百熙等奏请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的科举取士名额，以便“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到1905年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18]，至此，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被完全废止，这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此前历代虽不乏对科举制度的尖锐批判，可没有能够取而代之的教育体制；如今以西式学校来取代科举取士，无论在野在朝，

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就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后不到四个月,严复撰文历数从设京师同文馆以补旧学之不足到“一切皆由学堂”的经过,然后断言:

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19]。

其实,其时文人学士对废科举开学校的“结果何如”多有议论,维新派、革命派大致上都持肯定态度,只是可惜此等好事由政敌来完成。章太炎的思路却颇为奇特,昔年之攻击科举,如今一转而为挑剔学校的诸多弊病。因为在他看来:

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20]

兴废除弊,固是大好事,可浅学之士“以相诋耀,则弊复由是生”,此尚在其次;救偏除弊,不免矫枉过正,难得平心体会弊中之利、偏中之正,也难得警惕由此产生的新偏新弊,这才是最要命的。科举未废,倡学校可以救偏除弊;科举已废,则必须正视此救偏之“偏”、除弊之“弊”。章氏有时为抨击学校之弊,颇有以为其不及科举者,不过此乃激愤之语,当不得真。章学诚认定“风尚所趋,必有其弊”(《文史通义·说林》);其后学章太炎也不例外,断言“大抵成气类则伪,独行则贞”^[21]。循此思路,褒贬是非时不免严于气类已成风尚所趋者,而宽于日趋衰落者;因为“衰则少伪”,起码在人格上,固执已见胜于趋炎附势。

针对“学校虽劣,犹愈于科举”的时论,1906年,章太炎作《与王鹤鸣书》,表达他对学校“使学术日衰,乃不逮科举时也”的忧虑:

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此时俗所数称道者。远观商、周,外观欧、美,则是直不喻今世中国之情耳。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搁置,足以干禄,学

之则皮傅而止。……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22〕}

这里批评的实际上不是学校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优劣，而是其由于得到朝廷的提倡而可能成为新的利禄之途。

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的是使举子“求富贵而废学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23〕}。时贤认定救弊之法在开办学堂，教授对国家有用的新学。可学子必须衣食有着，方才谈得上研精穷本，这也是人之常情。于是，劝学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由朝廷出面赐以利禄。既然中国人“最重科第”，“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康有为建议朝廷因势利导，用奖励出身的办法来提倡译书与游学，比如“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士给翰林，庶官皆晋一秩”^{〔24〕}。梁启超的办法更直捷，所列兴学校养人才的“上策”，实为学校毕业与科举出身同等待遇；

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25〕}

这一主张符合大多数举子心理，而且短期内确实能见成效，故被清廷接受。1898年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建立京师大学堂，而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规定，“大学卒业，领有文凭作为进士，引见授官”；因为据说“前者所设学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无所用”^{〔26〕}。百日维新失败，可康梁办学思路仍被沿袭，1903年公布的《学务纲要》规定“毕业升等奖给出身”：试官依据学生考试成绩和平日品行，“分别奏请赐予各项出身，分别录用”；1905年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也不忘添上一句：“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

异”。^[27]这一制度的实行,对中国教育体制顺利地从科举向学校过渡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梁启超所预想的,由于进学校也能得到出身,故“天下之士,靡然成风”;至于是否真的“八年之后,人才盈廷”^[28],那可就难说了。以奖励出身劝学,固然使学校的兴办省却许多阻力。可这么一来,学校和科举又有什么区别,不都是“利禄之途”吗?

前人批评科举取士表面上是“以利禄劝儒术”,实际上则是“以儒术殉利禄”(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下》)。今人“以利禄劝新学”,又何曾能逃脱“以新学殉利禄”的命运?章太炎对清廷之如此兴学大不以为然,认定以“宫室舆马衣食之美”来“导诱学子”,只能使学子失却求学真意,但求报偿,“趣于营利转甚”。张之洞因斥巨资倡新学而享大名于晚清,章氏对此豪举殊无好感,就因为:

以其豪举施于学子,必优其居处,厚其资用,其志固以劝人入学,不知适足以为病也。……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微特遣大投艰有所不可,即其稠处恒人之间,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29]

发展下去就是“遗其尊亲,弃其伉俪”,故“人纪之薄,实以学校居养移其气体使然”。谴责都市生活、学校教育的毒害,使得原本淳朴的“乡邑子弟”,一旦“负笈城市”,即变得慕富贵患贫贱,^[30]此说与七十年代借以将读书人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颇为相近。不过,章氏的着眼点在于强调学子“淡泊明志”的自我修养,而不是主张朝廷可以让学子饿肚皮;学术发展的希望,在民间的自我努力,而不在官府的提倡奖励。

作为政治家,康梁热衷于走上层路线,希望从上至下推行其改良方案,故一切系于朝廷的“诏令”。而终其一生,章太炎基本上是

个在野的思想家,对官场始终没有好感,对朝廷兴学的诚意及效果抱怀疑态度,对“暴政”与“利禄”对学术的双重摧残有深刻的体会,故对康梁将振兴学术的希望完全系于朝廷的自新很不以为然。章太炎曾评述有清三百年学术,主要尺度是入仕与否,对谋得一官半职的学者颇多微辞。而朱鹤龄等“学虽浅末,然未尝北面事胡人”;江声“亦举孝廉方正,皆未试也”;陈奂等“以布衣韦带,尽其年寿”,此等“嘉遁之风”大为章氏所赏识。只可惜由于清廷改变策略,“以殿试甲第诱致其能文章者,先后赐及第无算”,士子逐渐醉心利禄,“嘉遁之风始息”^[31]。对清代此类专心学术无心仕进的朴学家,章氏称之为“学隐”,并给予很高评价。魏源为李兆洛作传时曾讥讽乾嘉诸先儒“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太炎于是针锋相对:

吾特未知魏源所谓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銜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迦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扈,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32]

将“学隐”作为“进退跋扈”中别无选择的选择,这话讲得相当沉痛,非切身体验,难得有此平情之论。如此“低调”,高人不愿言,烈士不屑言,伪君子更不敢言,可历史中人就这点选择的自主性。

强调“处无望之世”,即便像戴震那样“揣其必能从政”者,也都宁愿选择“学隐”,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章氏之推崇“学隐”,只是为了反清。章太炎论学确实有明显的反清和反官府的倾向,他之赞赏江藩所著《国朝宋学渊源记》“适可以嗣《春秋》,方太史也”,除了作者本人“没世未尝试府县廷,韦带布衣,以终黄馘”外,更因此书“所录止于穷阎苦行,排摈南方诸浮华士。而仕满洲一命以上,才有政治声闻,即弃不载”^[33]。章氏以为,读书论世,“当心知其意”,着力探讨作者留在纸背的“微言难了者”,江藩之“不录

高位者一人”，真正用心是鄙视“媚于胡族得登阮仕者”。^{〔34〕}可江藩的自述并非如此，有鉴于学有所成的达官贵人已“具载史箴，无烦记录，且恐草茅下士见闻失实，贻讥当世也”，故专门选录“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者^{〔35〕}，本无章氏所表彰的种族意识，最多是偏爱在野之学。章氏其实也明白这一点，讲完满汉之争，归结点还是官民之别：

故知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36〕}。

强调“学在民间”，突出民间社会在学术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章太炎的一贯主张。至于赞赏江藩之表彰“穷阎苦行”，与斥责阮元之“录诸显贵人”，则是有感于世人的官本位思想。学者学术成就的高低，与其官职大小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可居高位者容易沽名邀誉，一时间也能够转移风气，史家常被此类表面现象迷惑。

官府有钱有势，占尽天时地利，何以提倡学术反不如民间？就因为以权势利禄为诱饵，易以召徕世盗名之徒，难得赴艰苦卓绝之任。“学隐”之所以值得尊敬，并非因其政治倾向，而是因其不以“荣华”、“酒肉”为意，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37〕}。而政治上的节守与学术上的节守两者是相通的，耐不得寂寞者在官为学均无大成。“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38〕}这并非只是“士以气节为先”之类的道德说教，学术研究讲究“明微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39〕}非淡泊之士，何以深入堂奥？

在此意义上，康梁靠奖励出身来提倡学术的设想，颇有饮鸩止渴的味道。这一点，严复、王国维、蔡元培都有所反省。严复同意“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的说法，不过反对授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理由是：“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40〕}严复还只是从政学殊途的角度来反对以